

中国文学多维研究丛书

王志蔚 著

批判与重建：
鲁迅的文化选择与文学姿态

安徽大学出版社



中国文学多维研究丛书

王志蔚 著

批判与重建：
鲁迅的文化选择与文学姿态

安徽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批判与重建:鲁迅的文化选择与文学姿态/王志蔚著. —合肥:
安徽大学出版社, 2008. 4
ISBN 978-7-81110-424-0

I. 批... II. 王... III. 鲁迅(1881~1936)—思想研究
IV. I210.9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033809 号

批判与重建:鲁迅的文化选择与文学姿态

王志蔚 著

出版发行 安徽大学出版社
(合肥市肥西路3号 邮编 230039)
联系电话 编辑室 0551-5108241
发行部 0551-5107716
电子信箱 ahdxchps@mail.hf.ah.cn
责任编辑 李海妹
封面设计 孟献辉

印刷 合肥中德印刷培训中心印刷厂
开本 710×1000 1/16
印张 16.125
字数 250千
版次 2008年4月第1版
印次 2008年4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81110-424-0

定价 25.00 元

如有影响阅读的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出版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序

志蔚多年来一直致力于鲁迅研究，对鲁迅的创作和思想有着自己独到的见解。这次他将自己的研究成果结集出版，正是瓜熟蒂落之举。志蔚的闪耀着思想光芒的文字，引起了我对鲁迅人格和思想的诸多联想。

鲁迅有什么值得我们谈论的呢？是他的深刻而严肃的小说、哲学般深奥的散文？还是如投枪匕首般的杂文？这些都是，因为正是这些洋洋洒洒的文章构成了作为文学家的鲁迅。但仅仅说这些是不够的，因为在汗牛充栋的文学史中被以大篇幅谈论的不仅仅有鲁迅，我们之所以如此地热衷于谈论他，更重要的是因为他独特的人格魅力。

鲁迅首先呈现在我们的记忆中的是一个战士的形象。面对着飞溅而来的唾沫、面对着从不可知方向射来的冷箭、面对着巨大的来自政权和因循守旧势力的威胁，他挺直着他那并不高大的身躯，以一种巍峨、不屈的姿态去迎接战斗。人都有天赋的权力，但在许多的时候，我们放弃了这样的权力，而甘愿把自己的灵魂捐献给了灵魂的管理者。而鲁迅敢于主张自己的权力，敢于为周围的弱小者主张这样的权力，哪怕面临着泰山压顶，哪怕面临着刀丛血色，他仍然在血腥中诗意地挥动着如椽之笔，在漫天的罗网中插出一个窟窿。“一个也不饶恕”，他对那些损了别人的牙眼却主张宽恕的人，他的回答是斩钉截铁的。

这样的形象矗立在我们面前，当我们苟活的时候，想起那样的战士，将给予我们奋起的力量和勇气，给予我们一种大丈夫“抃扶摇直上九万里”的豪气；当我们已经彻底为某种势力所控制和征服的时候，他又像一面镜子，照出我们的丑陋，一种国民性的丑陋，十足的阿Q相来，那时我们可能会羞耻，也可能会恼羞成怒。

鲁迅当然并不仅仅是战士，也并不是像他的褻读者们所描绘的那样是个心地阴暗的戴瓜皮帽的小老头，而是一个坦率的、有亲和力的长者。当共

产党人瞿秋白生病从江西苏区到达上海时，当红军将领方志敏的文稿在其牺牲后传到鲁迅的手中时，是他帮助他们。当柔石、胡也频、丁玲这些年轻的作家被政府以种种借口逮的逮、杀的杀的时候，敢于为之奔走者几人？敢于“怒向刀丛觅小诗”的几人？冒着被杀头的危险，为朋友穿针引线的人，是值得信赖的人；在失去朋友之后，痛心彻首，慈母般梦寐思之，泪湿沾襟者，又不仅仅是朋友而是手足。这样的信赖如一道霞光在黑暗中闪烁，引导着流浪中的萧军、萧红从遥远的沦陷区东北投向了上海。从此后，假如没有光亮，我便是炬火。在那样的时代他践行着自己的诺言，在这样的炬火中，受伤的萧红享受到了春天般的阳光。

正是因为具有这样的对待恶者决不饶恕、对于弱小者不惜一切庇护的精神，敢于在恶浊、喧嚣的社会中挺直腰板活着的精神，敢于以自己的方式发出声音的精神，使得他在文学之外获得了更为广泛的尊敬。在1936年10月他逝世的时候，那潮水般送葬的人群正是对他的伟大的人格精神的证明。

虽然说志蔚的文字主要是论述和探索鲁迅思想和创作成就的，但阅读志蔚的文字，我仍然感受到了他对于鲁迅人格的信服，感受到了他理性论析的背面对伟大人格的精神皈依。

鲁迅之所以成为今日中国人文知识分子的精神楷模，除了因为他具有崇高的人格魅力之外，还在于他是今日中国学术研究和思想研究的资源之“源”。在我的感觉里，鲁迅是中国现代思想史、现代文学史的一个“结”，无论你是研究历史，还是研究思想或文学都必须从鲁迅开始，只有了解和理解了鲁迅才能解开中国现代。志蔚长期沉迷于鲁迅研究，并以此展开他的现代文学和思想研究，可以说他找到了很好的出发点。

鲁迅虽然没有系统的理论，但他却有着系统的思想。他的思想的总称就是“文化启蒙”。启蒙是新文化一代人的精神使命，也是鲁迅思想和创作的起点。而鲁迅的文化启蒙首在“立人”，这是鲁迅破毁旧传统、建构新文化的价值基点。在《文化偏至论》中，鲁迅提出“生存两间，角逐列国是务，其首在立人，人立而后凡事举”，“人既发扬踔厉矣，则邦国亦以兴起”。“致人性于全，不使之偏倚，因以见今日之文明也。”“其首在立人，人立而后凡事举；若其道术，乃必尊个性而张精神。”“今索诸中国，为精神界之战士安在？有作至诚之声，致吾人于善美刚健者乎？有作温煦之声，援吾人出于荒寒者

乎？”志蔚感受着鲁迅“人学”的人道主义精神和思想价值，以“人”为切入点而展开论述，抓住了鲁迅思想和创作的核心价值，也为他的鲁迅研究奠定了正确的理论基础。

鲁迅的人学观念，在现实的思想层面则体现为国民性批判精神。志蔚透过鲁迅的大量思想和创作文本，探讨了鲁迅国民性批判的具体内容和特点，并结合鲁迅和新文化时代的历史语境，广泛探索了鲁迅这一精神产生的历史与文化根源。为了彰显鲁迅国民性批判思想的独特性，志蔚特别将他与中国现代思想史上最具影响力的诗人思想家毛泽东进行了比较。志蔚认为，鲁迅与稍晚的革命家和思想家毛泽东在对待国民性问题上有着诸多的相似之处，但鲁迅作为思想家和文学家看到的更多的是国民性的弱点，所持的立场更多的是批判；而作为革命家的毛泽东虽然也对国民性弱点有着警惕，但从革命的现实主义出发，从革命的动员出发，他更多地看到人民尤其是农民的革命力量，所持有的立场是肯定的。这样的不同和差别集中体现在如何评价辛亥革命失败原因这个问题上。与志蔚的“不同论”和毛泽东“超越论”不同，我认为，他们对待辛亥革命的认识却是基本相同的。毛泽东的过人之处在于，他从辛亥革命的失败中懂得了动员农民参加革命的重要性，懂得了革命理论对武装人民尤其是武装农民的重要性。这恐怕是作为纯粹的文学家和思想家的鲁迅所望尘莫及的。在农民问题上，鲁迅认为，几千年的封建愚民政策造成了农民的落后、愚昧、麻木，特别是近代受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双重打击和愚弄，人民对辛亥革命更加茫然、隔膜和冷淡；而毛泽东经过深入调查研究后认为，农民虽然遭受到中外反动统治势力的统治、压迫和奴役，但是他们内心深处蕴涵着巨大的革命积极性和创造性，是中国民主革命的主力军和动力。毛泽东的认识比鲁迅更加积极乐观。而问题的关键在于，愚昧和麻木是没有“自信力”的表现，那具有革命积极性是否就意味着有“自信力”呢？阿Q也有革命的积极性，阿Q有自信力吗？因此，鲁迅后期对于国民自信力“恢复”了信任，而毛泽东对农民革命的信心，主要都源自革命动员的需要。

鲁迅的思想和他的创作是一体的，但鲁迅研究界对鲁迅最常见的“误读”也来自于由思想而解读作品，从而导致对作品理解的偏差。志蔚在对鲁迅进行思想考察的时候，他的卓见在于对思想扭曲作品主题的成见有着学理的敏感和辨析的睿智。志蔚认为研究界普遍存在着对于鲁迅与辛亥革命

的关系问题的神话，受这一神话的影响，在评价鲁迅以辛亥革命为题材的小说《药》、《阿Q正传》和《风波》这些作品的时候，往往以“作品批判了辛亥革命的不彻底性”、“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软弱性”以及“资产阶级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没有发动民众”等等政治性语言来概括评价其思想内容的深刻性。志蔚指出：“事实上这三篇小说的重心并不在于批判辛亥革命，而是在于批判普通民众思想上的迷信落后、精神上的愚昧麻木。鲁迅在表现国民性改造和中国近代政治革命这两个相关命题的时候，强调的是前者，是思想革命。对于后者，政治革命，主要是从思想革命对政治革命的制约这个角度来写的。”无论是鲁迅的小说，还是他的杂文、散文、书信；无论是在辛亥革命之前，还是在辛亥革命之后，鲁迅的启蒙思想始终围绕这一中心。鲁迅的思想启蒙与发动民众开展革命斗争虽然有一定联系，但却是两个不同层面的概念。鲁迅不是政治家，他没有毛泽东那样强烈的政治功利性和领导农民进行不懈斗争的实践，他的理论不可能与毛泽东关于农民问题的一系列革命理论相一致。显然，鲁迅的小说虽然也可算是问题小说，但鲁迅的问题是在文化启蒙的层面上，而不在政治的层面上。正是基于这样的洞见，志蔚发现了一个被政治化的审美问题，并予以纠正。志蔚的这一“纠正”虽然降低了鲁迅创作的政治“高度”，但却彰显了鲁迅创作的思想深度。

因了志蔚的鲁迅研究，我写了上面散乱的文字。之后，我想说，鲁迅研究是现代文学和思想研究中的一门显学。在如此的局面下，要坚持自己的学术“偏好”并建构自己的学术话语并非易事，而志蔚却一直坚持和努力建构着，这是我所感佩的。希望能够读到志蔚更多的鲁迅研究和现代文学研究的深刻文字。

方维保

2007年7月3日于金陵随园

目 录

序(方维保).....	1
第一章 关注国人的健全与解放.....	1
鲁迅改造国民性思想是怎样形成的.....	3
关于鲁迅改造国民性思想的理性思考	10
近年来鲁迅改造国民性思想研究综述	21
鲁迅的“看客”情结探源	27
近 30 年《药》的主题研究述评.....	39
第二章 社会变革进程中的文化反思	53
是东南英杰 还是蜕变官僚	
——我观鲁迅评价王金发	55
鲁迅对辛亥革命历史教训的文化反思	64
评近 30 年鲁迅与辛亥革命研究中的一种“神话”倾向	
——兼论资产阶级革命党与群众关系的认识误区	76
第三章 两位思想巨人的文化观照	87
鲁迅和毛泽东改造国民性思想渊源之比较	89
批判与重建:鲁迅与毛泽东改造国民精神的探索	101
毛泽东对鲁迅辛亥革命反思的历史超越.....	123
鲁迅与毛泽东教育思想产生的中西文化背景.....	142

第四章 先觉智识者的矛盾与不同选择·····	161
批判与接受:鲁迅与胡适对梅兰芳的文化选择·····	163
鲁迅与胡适儿童教育思想比较及其启示·····	176
鲁迅与胡适的妇女解放思想及其实践悖论·····	192
第五章 中国传统文化建设的价值取向·····	211
鲁迅戏曲思想的人民性及其启示·····	213
“人民本位”:鲁迅和毛泽东戏曲观的共同审美取向·····	220
附:鲁迅教学札记·····	229
鲁迅小说结构的创新·····	231
不写背景而背景毕现·····	235
学为人师 行为世范 ——鲁迅怎样当教师·····	238
鲁迅的创造个性·····	244
后记:我与鲁迅研究·····	249

第一章

关注国人的健全与解放

鲁迅改造国民性思想是怎样形成的

学界在谈到鲁迅弃医从文、决心改造国民性的原因时,千篇一律地说成是受到“幻灯事件”的刺激。这种说法过于简单,也不够准确。回到鲁迅成长的历史中重新审视,我们发现,“幻灯事件”不过是鲁迅思想发生重大转折的一个直接因子。鲁迅改造国民性思想的形成,其实与其惨痛的人生体验和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刻反省、近代中国启蒙思想家启迪以及近代西方关于中国国民性研究、明治日本国民性讨论热潮有着多样的、直接的联系。

一、源于刻骨铭心的人生体验和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痛切反省

1893年,鲁迅的祖父周福清因科场贿赂案入狱,父亲周伯宜被革去生员头衔,从此鲁家的生活陷入了困境。母亲带着年幼的鲁迅兄弟到亲戚家避难,那些势利的亲戚居然说他们是“要饭来的”。父亲得病后,小小的鲁迅有三四年的时间频繁出入于当铺和药店,要从比自己高出一倍的当铺柜台外送上典当的衣物、首饰,在世俗的轻蔑声中为治父病而奔波。作为长子的鲁迅不仅要承担起一部分沉重的家庭生活负担,还要承受着一些居心不良的亲戚、乡人的流言污语。家庭的突然变故及悲惨的生活经历,使“掉在冰水”中的鲁迅认识到,“有谁从小康之家而坠入困顿的么,我以为在这途径中,大概可以看见世人的真面目”。^①这是少年鲁迅对世人国民性最深切、最具体的感受了。为此,鲁迅想去寻找为S城所诟病的“另一类人们”,即去南京追寻“理想的人性”。然而,南京学堂“乌烟瘴气”的人和事太多,让人总觉得不舒服。这里既有水师学堂高年级学生“螃蟹式”的趾高气扬、官人姿

^① 鲁迅:《〈呐喊〉自序》,见《鲁迅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437页。

态,校内“关帝庙”的愚昧迷信,也有矿路学堂教员“华盛顿是什么东西呀”的无知。在鲁迅希望寻求“别样的人们”的东京,他看到的却是醉生梦死的“清国留学生”,这让他觉得“东京也无非是这样”。尤其是仙台医专的“幻灯片事件”给了鲁迅强烈的刺激,使逐渐走向成熟的鲁迅真正懂得:“医学并非一件紧要事,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①从这些大家所熟悉的鲁迅人生经历中,我们分明能感到鲁迅改造国民性思想首先来源于其灵魂深处的人生体验。

鲁迅“少喜披览古说”,封建旧文化、旧道德对其文化性格的形成影响很大。他曾这样说过:孔孟的书我读得最早、最熟,然而倒似乎和我不相干。他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猛烈抨击“古人写在书上的可恶思想”,把中国固有的精神文明指斥为“人肉的筵宴”、“吃人”和“被吃”的文明,他对中国封建文明摧残人性的批判可谓透入骨髓。然而他又深知,自己“苦于背了这些古老的鬼魂,摆脱不开”。读过《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我们可以深切感受到他那被压抑的“气闷的沉重”,他希望“从觉醒的人开手,各自解放了自己的孩子。自己背着因袭的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此后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②这段文字是鲁迅“用许多苦痛换来的真话”,是他心灵深处充满矛盾的抒情独白。鲁迅曾对中国封建的“孝”道进行过有力的抨击,但他却又屈从母命,无奈地接受了无爱的婚姻。这种痛苦和不幸促使他日后“为了后来的青年”的解放,决心彻底砸碎一切精神枷锁,唤起世人反抗旧传统,改造国民性。^③

二、源于中国近代启蒙思想家改造国民性思想的深刻启迪

改造国民性思想是清代末年的一种进步的社会思潮,一些启蒙思想家

① 鲁迅:《〈呐喊〉自序》,见《鲁迅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439页。

② 鲁迅:《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见《鲁迅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134页。

③ 程致中:《鲁迅国民性批判探源》,载《鲁迅研究月刊》,2002年,第10期,第4页。

都对这个问题有过深刻的思考。甲午战争后,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严复倡导“开民智”、“新民德”,改变“人心风俗”,这些都是鲁迅后来思考过的国民性问题。另一位启蒙思想家梁启超对鲁迅的影响更大。众所周知,弃医从文是鲁迅思想发展的转折点,但是应该看到,在由“医”到“文”的转变中,鲁迅的思想经历了一个渐变的发展过程。这一过程和梁启超一致:两人都从批判洋务运动开始,逐步把注意的重心转向了“人”。实际上,梁启超早在戊戌变法之前就意识到了人的重要作用,他在批判洋务运动时说,洋务派只知西方的汽机兵械而不知政事民情;只知操练买办,雇用洋人,而不知必先变人,培育人才。他认为洋务派的这种做法不知变法之本原,注定不能起到实效。在梁启超看来,中国“所以积弱之故,其总因之重大者在国民全体”。^①中国人身上的种种缺点、弱点导致了中国的衰微、落后,因此,中国欲图振兴,就必须首先从改造国民性、提高全民素质,即从“新民”入手。“新民为今日中国第一急务”,“舍此一事,别无善图”。^②梁启超率先由器物层、制度层转向文化层面,开始从“人”这一根本问题入手,寻求救国的途径。鲁迅也经历了这种转变。考察鲁迅早期的思想,可以看出鲁迅对以科学为手段的“实业救国”、“富国强兵”曾一度寄予希望。1903年,鲁迅发表《中国地质略论》,他认为“工业繁兴,机械为用,文明之影,资源是基础”。^③鲁迅也有过实业救国的梦想。但是,奸商们为了自己的利益纷纷引盗入室,不惜出卖国家利益,在国民素质低下的中国,实业救国根本行不通。鲁迅开始意识到国民素质的重要性,他批评那些“近不知中国之情,远复不察欧美之实”、“竞言武事”、把枪炮武器视为国家首事、一味强调“振兴实业”的洋务运动是舍本求末。鲁迅由批判洋务运动到确立“立人”的思想,把“立人”作为“立国”的前提,在这一发展脉络中,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鲁迅的观点和看法与梁启超的一致性。

鲁迅在《灯下漫笔》中也有精辟的论述,他说:中国人的生存状态不过是

① 梁启超:《中国积弱溯源论》,见易鑫鼎《梁启超全集》(上),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6年,第8页。

② 梁启超:《新民说》,见易鑫鼎《梁启超全集》(下),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6年,第589页。

③ 鲁迅:《中国地质略论》,见《鲁迅全集》(第8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5页。

“想做奴隶而不得”，“自己被人凌虐，但也可以凌虐别人；自己被人吃，但也可以吃别人。一级一级的制驭着，不能动弹，也不想动弹了”。^① 梁启超曾指出，民之愚同历代民贼呕尽心血、遍布罗网的驯民、役民、监民有直接关系，鲁迅也认为愚民的发生，是愚民政策的结果。这些相似之处表明，鲁迅与梁启超的改造国民性思想具有一脉相承的关系。^②

除了受严复、梁启超等人的影响外，辛亥革命党人、鲁迅的老师章太炎提出的用革命消除民族性格中的怯懦、诈伪、浮华，用革命祛除国民的“畏死心”、“拜金心”、“退却心”的主张以及邹容《革命军》中“拔去奴隶之根性”的呼号对鲁迅也有深刻的启迪。

三、受到国外研究中国国民性著作的深刻影响

外国人研究中国人的著作，较早的有法国大革命时代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该书曾以专章《西班牙人和中国人的性格》讨论中国人的特性；俄国的巴枯宁在《国家制度和无政府状态》中，也述及中国人的性格和习惯。19世纪末，美国传教士史密斯（中文名叫明恩溥）的《支那人的气质》（今译《中国人的素质》）对鲁迅的影响很大。鲁迅在日本弘文学院同他的老友许寿裳探讨国民性时已读过此书。史密斯在华传教22年，熟悉中国文化、中国人习性和中国的风土人情。他认为中国人国民性的根子是“面子观”，认为中国人重体面、重形式而轻事实，爱说漂亮话，讲排场，颇有些“做戏”的味道。要了解中国，只要抓住了这一点，就像是抓住了中国人的辫子，牵一发而动全身。^③ 对此，鲁迅十分赞同，他在《且介亭杂文·说面子》中谈到，外国人以为面子“这一件事情，很不容易懂，然而中国精神的纲领，只要抓住这个，就像二十四年前的拔住了辫子一样，全身都跟着走动了”。^④ 史密斯还谴责了中国的“二十四孝”违背人性，认为它是造成早婚、贫困、纳妾等一

① 鲁迅：《灯下漫笔》，见《鲁迅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222页。

② 尹康庄：《梁启超启蒙思想简论》，载《鲁迅研究月刊》，2002年，第8期，第32页。

③ 史密斯：《支那人的气质》，北京：京华出版社，2003年，第2页。

④ 鲁迅：《且介亭杂文·说面子》，见《鲁迅全集》（第6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130页。

长串弊端的原因,进而郑重地指出:如果保守主义不遭到重创,那么,中国怎么可能调整自己,去适应本世纪最后 25 年的全新环境呢?如果中国民族继续将过时的一代奉为神明,中国怎样能够向前迈出切实的一步?^①应该说,史密斯的这些论述对鲁迅的国民性批判和文学创作产生了深刻而持久的影响,以至在其逝世前 14 天还念念不忘,他说:“我至今还在希望有人翻出史密斯的《支那人的气质》来,看了这些,而自省,分析,明白那几点说得对,变革,挣扎,自做工夫,却不求别人的原谅和称赞,来证明究竟怎样的是中国人。”^②

日本人安岗秀夫的《从小说看来的支那民族性》也是外国人谈论中国国民性较为重要的著作之一。鲁迅读过此书后曾感慨地说,从小说来看民族性是一个好题目,从中可研究的新方面实在多。可是,中国人偏不肯研究自己。同时鲁迅还认为,该书的一些观点受到史密斯的影响和启发,但也有它的“发现”,例如第十章批判中国人是“好色的国民”,“耽享乐而淫风日盛”,而史密斯对中国人的“性”问题几乎没有涉及。鲁迅说,这种小册子大抵旋生旋灭,没有较永久的,其中有几点还算中肯,然而穿凿附会者多,阅之令人失望。

当然,鲁迅读过这些外国人研究中国国民性的著作,虽有所得,但却不满意。他曾感慨地说:“至今为止,西洋人讲中国的著作,大约比中国人民讲自己的还要多。不过这些总不免只是西洋人的看法,中国有句古谚,说:‘肺腑而能语,医师面如土。’我想假使肺腑真能说话,怕也未必一定完全可靠的罢,然而,也一定能有医师所诊察不到,出乎意外,而其实是十分真实的地方。”^③不管怎样,鲁迅对外国人研究中国人国民性著作的评价,比较客观,既有许多切中肯綮的批判,也有一些切实的感悟和接受。他真诚地希望中国人自己能够站出来说话,认真“研究自己”,进行民族自省和自奋。

① 史密斯:《支那人的气质》,北京:京华出版社,2003 年,第 166 页。

② 鲁迅:《立此存照》(3),见《鲁迅全集》(第 6 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年,第 645 页。

③ 鲁迅:《〈草鞋脚〉小引》,见《鲁迅全集》(第 6 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年,第 21 页。

四、受到日本国民性讨论热潮的深刻启发

鲁迅明确地使用“国民性”这一概念、从国民精神的角度思考改造中国社会的问题，始于留学日本后。据许寿裳回忆，鲁迅在弘文学院时，课余喜欢看哲学书、文学书，由此关注起国民性来。^①这与鲁迅所处的思想文化环境和时代风潮有着密切的关系，尤其是明治日本的国民性讨论热潮，对鲁迅有着直接的影响。日本（主要指近代日本）是一个极其热衷议论国民性（民族性）问题的民族。日本研究者承认，从1869年的明治维新开始，日本摆脱了长期的“锁国”状态，开始极力接触和吸收西洋文明。维新的结果：日本初步建立了各种新制度，社会有了长足的进步。于是日本人的“自我意识”开始萌生，讨论日本人国民性的热潮一发而不可收拾，其余脉一直绵延至今。日本著名评论家、时任风靡全球的综合杂志《太阳》主编的高山敏牛就曾说过：“国家的真正发达，只能基于国民的自觉心。有了国民的自觉心才能客观地认识民族的特性。”^②

鲁迅留学日本时期，正是日本先后取得甲午战争、日俄战争胜利，国民的民族主义空前高涨的时期，讨论国民性的文章和言论大量出现，如浮田和民的《伟大国民的特性》、千叶江东的《悲观的国民》、泽柳政太郎的《战争与国民精神》、贺芳矢一的《国民性十论》等。日本人通过国民性大讨论，达到了认识国民特性、发扬国民精神、增强民族自信心的目的。这时置身于思想启蒙和文艺活动中的鲁迅，每天跑书店、书摊，搜集书籍、杂志，读报读书，直接感受并接受了明治日本的思想文化。据周作人先生回忆，鲁迅曾看过当时第一大综合杂志《太阳》，并热衷于阅读刚出版的东京大学教授、著名文学研究家贺芳矢一的《国民性十论》。^③因此，可以想象，鲁迅处在明治日本的思想文化空间，感受着日本民族强烈的自省自强、开拓进取的时代氛围，面临祖国日益衰颓的危机，自然而然地要探讨如何使祖国富强的课题。那么，

① 鲁迅博物馆等：《鲁迅回忆录》（上），北京出版社，1999年，第487页。

② 潘世圣：《关于鲁迅的早期论文及改造国民性思想》，载《鲁迅研究月刊》，2002年，第9期，第4页。

③ 鲁迅博物馆等：《鲁迅回忆录》（上），北京出版社，1999年，第783页。